

# 文坛故旧录：编辑忆旧续集

赵家璧 著

中华书局

赵家璧先生(1908—1997),江苏松江(今属上海)人,现代出版家、编辑家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,四十年代辗转于桂林、重庆、上海,先后主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、晨光出版公司,对新文学出版事业贡献良多。数十年编辑生涯中,他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社科文艺著作。其中,蔡元培撰总序,胡适、鲁迅、茅盾等十人参与编选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(1917—1927),堪称新文学奠基期的总结性巨著,影响深远;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、钱锺书的《围城》等图书更是家喻户晓,进入现代文学名作之林。

赵家璧先生晚年发表了一系列“编辑忆旧”文字,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。这些文字,有的散见于报刊,从未结集成书;而结集成书者,也已多年未曾再版。值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,我们策划编辑了赵家璧“编辑忆旧”三种,于近期陆续印行,作为对这位老出版人的纪念。三书情况分述如下:

《编辑忆旧》,据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初版重予录排,酌作校订。

《文坛故旧录:编辑忆旧续集》,据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初版重予录排,酌作校订。

《书比人长寿:编辑忆旧集外》,搜集作者上述二书以外的相关文字及序跋编订而成,为首次出版。

三书的出版,得到赵家璧先生的子女与上海鲁迅纪念馆“朝华文库”的大力协助,在此谨致谢忱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〇八年六月



## 目 录

### 编辑与作家

- 2 鲁迅印象记
- 6 鲁迅书简“完璧”归赵
- 11 关于《北平五讲》和《三十年集》
- 17 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时的一件往事
- 22 曹靖华与鲁迅
- 24 编辑生涯忆茅盾
- 50 从茅盾给我最后一信想起的
- 62 老舍和我
- 126 老舍《四世同堂》的坎坷命运
- 131 巴金与“良友”
- 134 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
- 172 悼念郑伯奇
- 175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
- 180 哀胡愈老
- 185 忆往事 学叶圣老  
——庆贺叶圣陶先生九十寿辰
- 191 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几件事
- 215 回忆徐志摩与陆小曼
- 225 与夏衍的一封信

- 228 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——罗洪
- 232 葛琴有话要说
- 242 尼采译者徐梵澄正在研究佛学
- 256 李桦、野夫与《新中国版画集》

#### 国际文化交流

- 266 关于《美国文学丛书》  
——记费正清博士一封复信
- 271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日译本的苦难历程
- 286 怀念仓石武四郎
- 291 内山书店两兄弟
- 296 访日归来谈连环画的改革
- 305 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到中国
- 313 后记

# 编辑与作家

我有幸认识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秋，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，在以出版画报、画册为专业的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。总经理伍联德委托我专管文艺书，他打算在这一领域开辟一个新局面，这正符合我想干一番事业的志愿。正巧创造社老将、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，为了躲避敌人耳目，改名君平，来编辑《电影画报》。从此，我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开始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，产生了要多出有益于革命的文艺书的想法。我最先计划编一套《良友文学丛书》，不但要在外形上独创一格；而且在内容上要找第一流作家执笔。谁来带个头呢？自然想到大名鼎鼎的鲁迅。九月初，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，由伯奇陪我去内山书店谒见鲁迅。

文坛上当时流行一种说法，把鲁迅说成是严峻、怪僻、不易接近的老人，所以那天去看望他，虽怀有崇敬之情，还不免心存畏惧。当我们在内山的会客室一起坐下时，我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。其实，伯奇早把良友公司和我的情况向鲁迅介绍了。当我恳求他为丛书写稿时，他就亲切地问我为什么对文艺编辑工作发生了兴趣。接着他谈了他自己过去办未名社、朝花社等几个出版社的甘苦经历，最后说：“这是对今天的社会极为需要的事业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，其中也大有学问啊！”那天谈话的结果，鲁迅慷慨地给了我两部翻译苏联短篇集。临别时，他

风趣地对我说：“你要回去向老板说清楚，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。”果然不出所料，因为我们还在另一套《一角丛书》里连续出了丁玲、周起应（周扬）、钱杏邨（阿英）、沈端先（夏衍）等的作品，白色恐怖的魔掌也伸到良友头上来了。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，我们的门市部大玻璃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特务用大铁锤击破，还以良友公司为例，向同业散发了恐吓信。不久，文化特务姓汤的，以卖稿为名敲去了大洋二百元。当我把后一件事告诉鲁迅时，他一方面安慰我，鼓励我不要害怕，要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切勿莽撞硬拼，并经常赠书给我，予以精神上的鼓励；另一方面，他把上述两件事都写进了文章中去，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，起了“立此存照”的作用。直到今天，读者还可以从《中国文坛的鬼魅》和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中，看到这两件小小的史迹。

鲁迅对左翼青年作家，关心他们的创作，为他们修改文稿，有的为之作序，有的介绍出版。我就从鲁迅手中接受出版过好几部青年作者的文稿。鲁迅还关心左翼青年作家的生活，其中对丁玲的事，给我印象最深。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捕，鲁迅通过郑伯奇，要我把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《母亲》立即出版，并且要在《申报》上大登广告，作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。丁玲被幽禁于南京期间，该书大受读者欢迎。年底结账，作者应得版税为数可观，但作者湖南常德家乡来信要求领取版税者不止一人，会计科颇感为难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，鲁迅有事来良友公司看我，我顺便把此事请教他。他回去替我们打听到了丁玲母亲蒋慕唐老太太的确切地址，写信给我说：“如来信地址，与此无异，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。但又闻她的周围，穷本家甚多，款项一到，顷刻即被分尽，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，待回信到后，再行续寄为妥也。”当时丁玲的老母幼儿住在常德，生活极为困难，鲁迅对她们亲切的关怀，周到的设想，多么感人啊！无怪一九七九年冬我在北京参加四届文代会期间去医院看望丁玲，第一次把这件发生在四十余年前的旧事告诉她时，她久久地说不出话来，然后嘘了一口气，轻轻地自语着：“对这些事，我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啊！”说话时，眼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。

鲁迅重视文艺读物的教育作用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效果。当时旧连环图画这一普及形式，内容大都宣传封建迷信、神怪武侠之类；有一种极左论调，认为“旧瓶不能装新酒”，必须探求一种新形式的大众文艺读物。鲁迅不同意这一看法，主张这一文艺形式是值得利用，“加以导引”而逐步改造的。他除了支持良友公司出版麦绥莱勒作《木刻连环图画故事》外，一九三四年夏，曾指示我设法打进旧连环图画出版商的圈子，找一两位有进步要求的旧连环画画家，由我们供应新内容的文字脚本，以便“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”。可惜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，我经过两次尝试，一事无成。我把失败经过告诉鲁迅时，他劝我不要再去寻找那些专出旧连环图画的“霸头”了。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：“你再去找的话，可能把你痛打一顿。”接着他对我说：“这条路，今天走不通，将来总会有人走过来的！”这次任务虽未完成，对我教育意义也还是很大的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，鲁迅来良友编辑部为《苏联版画集》选画。在我那只有十多个平方米的编辑室里，他坐在我的写字椅上，把入选的放在左边，不要的放在右边。等他工作完毕，已近下班时分。我请他休息一下，他站起身，伸了一下腰，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，接连咳嗽起来，我才发觉这个下午把他老人家累坏了。这一天，为了介绍十月革命的辉煌业绩抱病选画的情景，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，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良友，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。此后他就病倒了。鲁迅曾答应为画集写序，但到六月中，他已病得连每天必写的日记都停了，美国医生发现他的肺病已进入最后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，他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病榻上，口授序文四段，由许广平代笔书写。序文中说：“参加选画是做到了，但后来却生了病，缠绵月余，什么事也不能做。”最后说：“要请读者见恕的是，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，不能写出一点新东西来。”我们可以想象他虽在大病之中，天天发高烧，还念念不忘于这部版画集的出版。鲁迅把出版工作看作是崇高的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因此虽然经受着重病的折磨，还要在病榻上如约地写出新序，真正做到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

八月初，病情略有好转，鲁迅又为老朋友曹靖华编译的《苏联作家七人集》的出版热心起来了。经过函商，八月底，我们接受出版。鲁迅又忘我地为住在北平的译者代为编选、设计插图，并写信告诉我，因为译者“学校已开课，他教的是新项目，一定忙于预备”，所以要我把清样送鲁迅校阅，他还要为此书写一篇序文。他处处想到的是别人，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。九月五日，他觉得自己的病可能不起，写下了那篇立下七条遗嘱的《死》。九月七日，我复他信中曾答应过一个月内可把清样送校，但到十月十二日，译稿清样尚未寄去。鲁迅等得不耐烦了，写了一封简信给我。信中说：“靖华所译小说，曾记先生前函，谓须乘暑中排完，但今中秋已过，尚无校稿见示。不知公司是否确已付排，或是否确欲出版，希便中示及为荷。”这最后几句话，带有质问的意味，老人家第一次对我生气了。在鲁迅给我的四十九封来信中，这样的话是极为少见的。我虽然立即向排字房讲妥，十五日去信表示歉意，并保证二十日送校。不料十九日晨，鲁迅先生遽然长逝，终于来不及看到这份清样，这已成为我生平最大的遗憾了。

从第一次见到鲁迅那天起，他给我的印象，就和当时外界传说的完全两样。经过四年多时间通信和见面的接触，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，有说，有笑，偶尔也对我生气。对文学青年，鼓励、帮助，指出努力的方向。鲁迅对文艺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和重视，随处表现的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始终鼓舞着我。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，追叙以上几件给我印象最深的事，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、感谢和纪念。

1981. 9. 1.

一九三二年离开大学正式开始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后，鲁迅先生一共写给我四十九封信，最后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的，离他逝世之日仅七天。现在查对《鲁迅日记》所载，被我不慎丢了三封，仅存四十六封。抗战爆发，接着“孤岛”沦陷，我在工作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遭日寇查封。离沪去桂林前，曾把这批书信放入中国银行保管库中，得以安然无恙。

一九四五年年底，抗战胜利，从重庆回沪，暂住愚园路俭德坊旧寓。次年三月间，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讲学，途经上海，我在寓所为两位老友设宴饯行。应邀作陪者有郑振铎、许广平、靳以、巴金、凤子和赵清阁等。那天除了为出国的两位朋友祝酒，祝愿他们旅途愉快外，我们这些不久之前才先后分别从重庆回来的人，对“孤岛”时期坚守岗位备受日寇迫害或威胁的许广平和郑振铎两位深表敬意，都希望听听沦陷期间文艺界的情况，和他们目前的编写工作。许广平就谈到这几年，她向各方友好搜集到的鲁迅书信已达八百余封，正在排校中。她说，鲁迅逝世后，她曾把六十九封交吴朗西，于一九三七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用大开本宣纸影印出版，颇得好评。以后曾计划把已搜集到的全部影印成集，由蔡元培介绍，已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，不料抗战

爆发，影印之举完全落了空。一九三八年编印《鲁迅全集》时，未把书信部分列入，还是为了将来不影响书简手迹影印本的销路。现在一搁十年，只能赶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前，先出版一部铅印本了。席间，她向在座者呼吁，希望大家支援，如手头还有，时间虽极紧迫，还赶得及的。

郑振铎听了就指着我说：“鲁迅先生曾有许多信给你，你是否带到内地去了？”靳以还记得《文季月刊》出版纪念鲁迅逝世专号时，他曾向我借用一封作为插图，因此也敦促我成全这件好事。我当然乐意这样做，但信件都不藏在家中。许广平听我说到总数约有五十封左右，她高兴得眉飞色舞，马上与我约定去霞飞坊交信的日子。当时大家谈起鲁迅先生所用的信笺，三十年代，才大量用北平彩色笺纸，可能是受当时鲁迅、西谛（郑振铎）合编《北平笺谱》的影响。我才记起鲁迅写给我的信，有半数是在彩色笺纸上的，我因而对郑振铎说：“单色影印白纸黑字，不能说已还以‘历史的真面目’，有朝一日，把鲁迅书信全部按原有笺纸的色彩套印，像你们印的《北平笺谱》一样，那才算是保持真迹了。”振铎拍拍我的肩膀，含笑地说：“家璧，你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！”大家一笑置之，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梦想而已。

一九四六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期间，厚一千余页、红绸面精装本的《鲁迅书简》问世了。许广平在《编后记》中提了这样一笔：“我们还得感谢一些朋友，如赵家璧先生，他听说我们在印书简，就连忙亲自借送给我他自己珍藏的信件，里面还有鲁迅写给郑伯奇先生和他的三封信。”合共四十九封。她在还我原件时，把她在付排时亲笔写的一张加注字条也夹入在内，这是她所不知道的。

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春，为便于保藏，我把散页的鲁迅书信，托装订厂用蝴蝶式精裱，共五十六面，册页板上裱以仿古缎，装在一漆木匣中，外加纸匣。这四十九封鲁迅手迹，除一部分写在白宣纸或稿纸上者外，其他所用笺纸，都刻印着各种不同色彩的花草虫鱼，文房四宝，也有古色古香的人物画。加上“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，所遗手迹，自成风格……远逾宋唐，直攀魏晋”（郭沫若语），整部册页就是一件艺术品。

其中更具有史料价值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间的两封。现查《鲁迅手稿全集》中从一九〇四年开始所写的一千多封书信中，简直没有不用毛笔的，而这两封却用的是钢笔，内一封仍由鲁迅用毛笔署名。原来那正是他每天发烧，病体垂危之际，为了不误出书日期，仍在病榻上向许广平口授代写的。许广平在把这两封信编入《鲁迅书简》时，在纸条上加了注解：“七月七日、十五日二信，因鲁迅正患大病，由他逐字口述，广平代笔写寄。”我把这张无意中得来的字条，也裱在此信之旁。这些是铅印本所无法表现，而读者也见不到的。因此，“文革”前，各地文坛友好每到我家做客，我总像小孩子爱在生客面前献宝那样，从书柜中小心地取出，坐下来共同鉴赏。我还曾拿给当时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谢澹如过目；我说：“暂时由我保管，将来一定送给纪念馆。”他说，时间迟早不重要，他一样表示感谢。

这本匣装册页的鲁迅书简，一直在我书柜里安睡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。造反派在把我关入牛棚后不到半个月，一纸“勒令”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门口一块白墙上，限我次日上班前，把我珍藏的三十年代“文艺黑线人物”的全部书信上缴。原来本单位早已有人知道我藏有著名作家书信六七百封，内有茅盾、郁达夫、郑振铎、沈从文、张天翼等的，我早已分别捆扎，整理齐全；特别是老舍书信约二百封，我已按时间先后装订成册。第一次来抄家时未被发现，这一不及掩耳的迅雷，我只有服从“命令”，乖乖地送去了（这批重要文物至今未还）。当我交给那个造反派小头目时，他还恶狠狠地问我，还藏有其他的同类“黑材料”否？我坦白说：“还有鲁迅的四十九封，已裱成册页。”那个家伙板起面孔对我大吼一声：“鲁迅的信是革命的，我们不要！”这样，我在牛棚期间，家里阁楼上还藏着这匣册页，放在一堆破棉絮里。因为书房、书柜和大批图书，都已不属吾有了。

一九六九年十月底，林彪“第一号命令”下达时，我们早已下放到奉贤柘林农村了；白天田间劳动，入夜，睡在铺上薄薄一层稻草的烂泥地上。一个晚上，大伙十来人席地而坐，开会讨论如何响应这道命令，据说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，都要上缴组织代为保管。大家面面相觑，尽无

言语。几次抄家，屡屡勒令上缴，还有什么留下的呢？我们这些人，手中哪会有什么革命文物呢？沉默了十多分钟，忽然有人向我指指点点，接着说：“你家里不是还藏着一本鲁迅书简的册页吗？那还不是头号的革命文物？”大家正在无法解脱的沉默状态中，忽然找到了一个对象，于是群情振奋，众口一词；我才恍然大悟，我在这方面还是个大富翁呢。下星期日轮休回家，从阁楼上找出了这只宝匣，亲自送到绍兴路五十四号的连部驻沪办公室，换来一张代为保管的收据。临行时，经办人还安慰我说，但等天下太平，定必原物发还。从此这只藏有鲁迅书简的宝匣，也就不归我有了。住在干校期间，远道来外调的仍然络绎不绝。一九七一年五月间，有两位外调人员，一反常轨，见面和善可亲，热情地走向前来，自我介绍说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派来的。一开口，就向我说我捐献的鲁迅书信，不但数量多，而且加工裱装得如此精美，是他们长期征集工作中所未遇到的，因而特来道谢。此来拟问我是否还有关于鲁迅的纪念品，可供纪念馆征集展出。我答以早已空无所有；但我到此才懂得连部所谓代为保管之说，根本是一派胡言。工、军宣队擅自处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，令人气愤。但一转念，这部册页我早已向谢澹如说明迟早要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，当时谢公虽已谢世，我保藏的鲁迅书简，既已直接交给纪念馆，有个妥善的归宿，我也释然于怀了。

一九七六年初，周海婴提出书面要求，把已搜集到的鲁迅书信影印出版，免得原件失散，那将是无可挽救的。批示同意后，北京文物出版社立即着手，把分散各地的鲁迅书信限期集中北京，然后摄影制版。最近据纪念馆同志告诉我，上海鲁迅纪念馆所保藏的全部鲁迅书信，包括我那匣册页在内，先存于上海藏品库，一九七三年运往安徽后库。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，他们命把这批属于上海的书信从后库送到北京，当时文物出版社还设在著名的红楼内。不料二十八日夜半，正值大地震发生。这批稀世之物，幸而没有遭遇更大的意外。

从各地集中起来的一千三百八十八封书信，文物出版社全部用特制宣纸，珂罗版套色影印，印刷效果极佳，与原件一模一样，一般人几乎不能分辨。印刷过程历时三年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完成。线装分订十

六册，装成两函，名《鲁迅手稿全集·书信》，因成本浩大，印数有限，全套售价八百四十元。虽非一般读者购买力所能及，但把鲁迅一生所写的迄今能搜集的全部书信原色原样影印问世，使解放前我们这批人（包括郑振铎在内）认为难以想象的一个梦完全实现，不能不说是我国出版界的一大工程！记得文物出版社同志来沪向我谈起此事时，我曾向他建议，可否把上机印刷前的试样数页，留下一份，然后按原收信人，也就是原捐献人名，汇集一起，分别赠送，以志纪念；这在出版社不费吹灰之力，对收受者将是莫大的安慰。此议初被采纳，后因故未见实现，实在可惜！

我曾把此意向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同志吐露过，想不到他们于去年立下宏愿，把馆藏的两套《鲁迅手稿全集·书信》中的一套，共两函十六册，拆成散页，按收信人分别整理，准备陆续拓裱，分赠给所有的收信人。这真是做了一件值得表扬的大好事，可以加强上海鲁迅纪念馆与鲁迅先生生前友好之间的联系。不久前，他们已把属于我的四十六封，（其他三封写给郑伯奇和我二人，不在其内。）按原来的蝴蝶式精裱成一部册页，最先专诚送到我家里。展阅全册，几可乱真。对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这一富有意义的工作，不但我个人感到喜出望外，听说他们还将对所有个人，不论书信数量多寡，本人或其家属，只要有可靠的书面证明，和他们通信联系后，将来都可获得这种几乎逼真的复制品。而对数量较多的如曹靖华、李雾野、黄源、萧军、李桦等，还将裱成册页分赠，这肯定会得到这几位鲁迅挚友的欢迎。老友们向我建议可写成文章，我就根据这一文坛喜讯，草成此文，既有史料，又有信息，但想不出适当的题目。老友徐承烈兄说，何不用完璧归赵的典故，我认为这倒语含双关，但应在完璧二字上加一引号，因为这些鲁迅书简手迹，究竟已非原物了。

1984. 6. 29.

今年十月十九日将是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祭。我过去凭借“文革”期间幸得保存的鲁迅写给我的近五十封信，写过一本题为《编辑生涯忆鲁迅》的回忆录（人民文学版，1981年），包括十篇文章。最近查阅这批来信的复制件，还有两件重要史料没有向社会公开过。今撰写此文，聊表我对鲁迅先生满腔的缅怀感激之情，也可以补前书之不足。

—

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，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，鲁迅从上海去北平探望母病。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罗竹风在回忆“五讲”、“三嘘”时说：“据我所知，他到北大讲演是应国文系主任马幼渔之请，到辅仁、女子文理学院、师大、中国大学是分别应沈兼士、许寿裳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老朋友的邀请，而总其成者都是北平左翼作家联盟。还有所谓‘三嘘’，是一嘘梁实秋，二嘘张若谷，三嘘杨邨人。鲁迅准备根据当时的记录，结集出版一本《五讲三嘘集》，但这一愿望并未实现。”

那年鲁迅南归后，我正在良友图书公司开始编《一角丛书》，通过郑

伯奇的关系，左翼作家丁玲、钱杏邨(阿英)、林伯修、周起应(周扬)、沈端先(夏衍)等已先后为丛书写稿。这套书在出版上有一大特点：半个印张，加封底面，一万五千字，售价一律一角。那年九月，《良友文学丛书》已约到了鲁迅的《苏联作家二十人集》译稿。是年底，我听到鲁迅已返沪多日，便写信去约稿，希望他把北平五讲稿给我，编入《一角丛书》。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，收到鲁迅亲笔复信说：

在北平的讲演，必不止一万字，但至今依然一字未录，他日写出，当再奉闻。

先生就怕超过丛书规定的字数，但并未拒绝我的请求。另一方面，他于二月十二日去信给北京的台静农说：

在辅大之讲演，记曾有学生记出，乞兄嘱其抄一份给我，因此地有人逼我出版在北平之讲演，须草成一小册与之也。

可见鲁迅在复我之后，曾有意向北平搜集记录稿，准备编成一本册，列入小丛书。而他用了个“逼”字，我这个青年编辑和这位伟大作家之间的关系，尽在此中了。

三月初，《艺术新闻》在《出版消息》栏内，说此书将以对梁实秋、张若谷、杨邨人用“嘘的方法加以袭击”。我又去信鲁迅催问。他于三月十日来信说：

来信收到。我还没有写北平的五篇讲演，《艺术新闻》上所说，并非事实，我想不过是闹着玩玩的。

此后不久，鲁迅在《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》中，直截爽快地对杨说：“我曾说，这些都要以一嘘了之，不值得反驳，这几个人中先生也在其内。”《艺术新闻》把这消息一传开，鲁迅著作的老出版人李小峰，不甘

示弱,当时北新书局与鲁迅的稿费纠纷虽尚未完全解决,也向鲁迅展开争稿的一幕。鲁迅三月十五日,复李小峰的信是这样说的:

关于“北平五讲”之谣言甚多,愿印之处亦甚多,而其实则我并未整理。印成后,北新亦不宜经售,因后半尚有“上海三嘘”,开罪于文人学士之处颇不少也。天马亦不宜印,将来当仍觅不知所在之书店耳。

一九三三年间,鲁迅曾准备修改或追记在北平的讲演记录稿,和其他文章,编为《五讲三嘘集》。因记录稿错误甚多,甚至与原意相反,所以次年十二月十四日给杨霁云信中说,这些记录稿“实在记得太不行了,有时候简直我并没有说或是相反的,改起来非重写一遍不可,当时就因为没有这勇气,只好放下,现在更没有这勇气了”。

在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文化“围剿”的三十年代,鲁迅的杂文集极受青年读者的欢迎,但他从保护几块进步出版阵地免受打击出发,常常用一个“不知所在”的书店如三闲书屋、野草书屋等出面,自费出版,转交内山书店公开出售。我看到关于北平“五讲”的文稿既无到手的希望,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间,我转而恳请他给我一部杂文集,编入《良友文学丛书》,字数就可在十万左右。九月一日,鲁迅复信说:

近一年来,所发表的杂文,也还不少,但不宜于给良友公司印,因为文字都很简短,一被删节,就会使读者不知道说什么,所以只好自己出版。能够公开发行的东西,却还没有,也许在检查制度之下,是不见得有的了。

那本连书名都已拟好的《五讲三嘘集》,就这样永远没有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,而且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,冯雪峰所写《鲁迅生前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——片断回忆》一文中,也未提及此书。我今天回忆这本和我有关的未完成文集的来龙去脉,也作为冯文的补笔吧。